荆史拾零

漫话沙市卷烟业

□ 段绍华

沙市中山路兴茂合烟厂“大军战”烟标。

沙市三府街蔚泰烟厂“双凤”烟标。

1940年6月8日，日寇入侵沙市后，沙市与外地交通不便，市场上销售的香烟，多为日伪合作社供给的“旭光”等少数牌号的烟，一般人不容易买到。日寇投降后，市面上才逐渐有“红金”“大前门”“白金龙”“双斧”等申、汉烟销售。由于这些大城市烟厂的生产能力有限，供不应求，沙市的卷烟工业由此应运而生。

开始是手工卷烟，卷烟户遍街都是。究其原因：一、投资不需大本钱，钱少小搞，钱多大搞；二、无需铺店、门面、场地和橱窗、柜台、货架，自家住房就可生产；三、劳动量轻；四、全家老少都可参加；五、周转快，“吹糠见米”，做出来就可卖钱。

当时卷烟用的烟叶主要来自襄樊与南阳之间的河南邓县，其烟叶色泽金黄，有油质、香味纯正。也有湖南益阳及松滋刘家场、曾埠头的。沙市郊区杨场也生产烟叶，虽烟质较差，然成本低，也间或采用掺合于其它烟叶。市内有几家山货行代为销售，如华兴公（原红旗百货商店侧面）、甘义兴（今解放路）、泰记（今解放路）等处。

卷烟必须将烟叶切成烟丝，切之前用水喷湿。有的是将去筋喷湿的烟叶重叠成约30厘米高、放进小铡刀里用手铡（像中药店切药片）。如需量大，就将去筋烟叶重叠至70厘米厚，打成紧捆，然后用刨刀刨，叫刨烟丝，有专刨烟丝的作坊。因烟叶在切刨之前要喷洒水分，重叠时烟叶颜色要变黑，重叠越厚，捆得越紧，对质量影响越大。到1947年，有了专用切烟丝机切烟丝的专业户，如张宝举（原解放路二小隔壁）。

手工卷烟的劳动量虽然不大，但做起来还是够麻烦的，如将烟叶上的烟筋撕去，这种活又脏又累。把撕好的烟叶送去切成烟丝、冲浆糊、在卷烟纸上盖上商标图章、在烟丝里喷洒沃古林等香料；卷香烟、锯烟、烤烟、包装，然后才可销售。

生产卷烟最主要的工序是卷烟。卷烟机用木盒制成，约一尺见方，盒上粘有一张坚固的牛皮纸，牛皮纸下面放有一根约一支香烟粗、七支香烟长的小铁棍。按需要的份量将烟丝撒在牛皮纸上，另放上一长条涂有浆糊的卷烟纸，用两手捏住铁棍两头向前推动即成为一根约五支烟长的卷烟。积累数十根时，放在锯烟的木盒内。此盒为长方形，两头无档板，上面无木盖，两侧的木板上，每隔一支烟长的地方有一条裂缝。然后用钢锯条制成的小锯，从裂缝中锯下，便成为一支支香烟。经过烘烤，最后包装成盒。包装工人技术非常熟练，用手一抓就是20根，一天可以包五六十条。

这些手工卷烟者大多是城市贫民和个体劳动者，而且多是全家人参加劳动，也有临时雇请工人的。如曾舜卿（现民主街口）、周家恭（原堤上大同三街）、凌世杰（便河桥头）、马德山（梅台巷口小巷内）、王东源（胜利街张家三巷附近）……。

与此同时，也有为之配套的行业产生，如前面说的切烟丝的；有专印香烟包装纸的小印刷厂，如汤润之的裕华印刷厂（在梅台巷口），还有张尽美（崇文街口）、熊炳贵（青杨巷内）、沈有为、谌记（皆在平安巷内等）；有为卷烟做外包装大纸盒的（香烟条装大纸盒），如沈海记（原堤上大同二街）；有代为卷烟户将卷烟纸理成扎的（卷烟盘纸只能机用，如改作手工用必须理成一扎扎的长纸条）；有专刻墨头的（即每支烟上盖的商标印，用木刻或牛角刻，改机制烟后为铁刻的）等等。

当时，也有用四川烟叶卷烟的，这种卷烟无需将烟叶切成丝，也不用卷烟纸，只用烟叶直接将烟叶卷成长条，生产时只需切刀和浆糊即可。沙市人称此为“叶子烟”，又叫“金堂烟”。生产叶子烟的有顾荣生的“飞虎牌”（原江汉电影院处）、刘协和的“和合牌”（胜利街大赛巷口），还有江渎巷、回澜巷等处也有人生产。

1946年，沙市开始机制卷烟，为一姓刘的开办的华中烟厂（在今胜利街张家三巷口）所产。该厂由河南某地迁来，其资金雄厚，生产“弟弟牌”和“荆州牌”两种。“弟弟牌”价廉，劳动人民多吸此烟，销路很广；“荆州牌”价格较高，销路也不错。后来，该厂不知何故逐渐紧缩，最后关门停业。

1947年后，沙市本地的手工卷烟户逐渐联合办起机制卷烟厂。开始为木机，与铁机相仿，即木质机座，转动与制烟部分为铁质。其动力为手摇，在主机的前面有一个大转轮，安装在木座上。两个壮汉各站转轮的一边，用手摇动转轮，通过皮带的传导，转动机器制出卷烟。主要厂家有福彩烟厂（原和平一街尾靠堤处，仅此一家为独家经营），华洋卷烟厂（先在现胜利街原公安局对门，后迁至原中山横街口改名为“集成烟厂”），为手工卷烟户曾舜卿、丁凤梧、谌瑞庭等人合伙经营。该厂先为木机、后改为铁机，并备有切烟丝机。这些厂家所产卷烟行销荆沙周围县镇。

1948年又有手工卷烟户，如凌世杰、周家恭等，合伙经营华联烟厂，开始创办时没有机器，是找夹贵街（后为中山横街）一姓何的租赁的木机，租金每月为大米5担（为老容量单位，每担10斗，约合现在78公斤）。该厂以生产船牌香烟为主，由于经营不善，生产半年后濒临破产。1948年下半年，该厂生产的金枪牌香烟在当阳的淯溪、河溶一带打开了销路。客户为了盈利，又怕物价猛涨，都是先付款后取货，资金得以周转，该厂才转危为安。

这个时期，武汉大业烟厂倒闭，该厂股东代理人钟汉三携带剩下的部分资产搬迁沙市，与华联烟厂合并，厂名仍称“华联”。大业烟厂带来了铁制卷烟机与切烟丝机各一部，还带来了大批印有“绿鹦哥”和“红皇后”卷烟的商标牌号及包装，从此，结束了木机制烟的历史。该厂原在便河桥头，合并后迁至豫章会馆戏台的里面（原便河路二小后面）。

与此同时，曾有王让之兄弟二人与华联厂合伙经营，但不足两月又分开。不久，该厂搬迁到四川万县。华联烟厂后来又迁到克成路（即现在的新沙路清真寺隔壁），改名为“九成烟厂”。开始还勉强维持，后来就一蹶不振直至倒闭。

沙市机制卷烟业除以上三厂外，先后还有福记烟厂（在现在的教育幼儿园附近，该厂因在楼上煨汤不慎引起火灾，毁于一炬）、大华烟厂(在现中山路群艺馆对面)，六合烟厂（在胜利街口对面中山路上）、华康烟厂（现崇文街，原为药店后为织布厂）、福兴烟厂（共和巷口）、××烟厂（原黄州会馆，崇文街小学后面）、××烟厂（迎禧街中段）、新新烟厂（今胜利街港务局宿舍处）等，这些烟厂都备有铁制卷烟机和切烟丝机，其制烟程序与手工卷烟基本相同，仅生产范围与生产量较大而已。

后来，除生产20支装的盒装烟外，又生产一种50支装的白大包烟。这种卷烟只用一张白纸一包，在白纸上印一种单色商标即可。如九成烟厂生产的“梅鹊牌”和“民生牌”，因经济实惠，颇受劳苦大众的欢迎。

当时除机制卷烟厂外，仍有不少手工卷烟单干户（较大的卷烟户均合伙办烟厂去了）。机制烟厂每生产出一种畅销的香烟，就有手工户假冒其产品。如九成烟厂生产的民生牌50支装的香烟，较受群众欢迎，很快就有假冒的“民生”充斥街头。这些假冒烟影响了畅销烟的信誉，生产厂家不得不重新创牌，几经折腾，倍受损失。

解放后，申汉烟如“飞马”“双斧”“腰鼓”“金禄”等名牌香烟大量涌入，沙市的卷烟就很少生产了。上世纪50年代初期，工商业逐步开始公私合营，市商业局和供销合作社共拿出资金1.5万元，华中、集成、福彩、华大等私营厂家皆以生产资料作价入股共1万元，成立了“更新烟厂”（原便河西路人民剧场招待所处）。1952年该厂不慎失火，生产车间（包括卷烟）全部焚毁，原料车间因在另一边（原人民艺术团内）而幸免。不久，该厂关闭，沙市的卷烟工业也逐渐消失了。

读楚笔记②

江汉平原，楚国崛起的中兴之地

□ 张卫平

“文王熊赀立，始都郢。”2000多年前，司马迁就告诉我们，楚文王从丹阳迁都荆州纪南城。而范文澜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亦写道，“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，有地千里”。从“子不过同”到“有地千里”，再扩展到“地方五千里”，皆因楚文王于公元前689年迁都荆州纪南城，以富饶的江汉平原为依托，走上高速发展之路，从而强势登上中国历史舞台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文王定都荆州，成就了楚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400年。

那么，荆州是怎样得到楚王青睐的呢?对此，荆州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从礼先生认为，“纪南城北有纪山，西有八岭山，东有长湖，南有长江和浩大无边的云梦泽，山山水水均可为防御的自然屏障。在交通上，纪南城位于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要道，既能防，也能守。在经济上，以纪南城为中心的江汉平原雨水充沛，土地肥沃，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。在政治上，纪南城正位于东西南北的中心地带，北上、南下、东进、西出，大有英雄用武之地。”

俗话说，湖广熟，天下足。当年，楚文王来到这片荒芜之地时，脑海里一定浮想着若干年后粮食大丰收的场景。如今，我们在描写荆州时常会说“荆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”，此非官话、套话，而是古而有之。据《战国策》记载，苏秦游说楚威王时，曾称楚国粮食丰饶，“粟支十年”。在农耕文明时代，楚国有着农业灌溉的天然优势。楚庄王时，令尹孙叔敖兴建水利灌溉工程，推进农业生产，使楚国“地势饶食，无饥馑之患”。当然，这是后话了。

掌控着丰腴、富饶的江汉平原，手中有粮的楚王底气十足，开始谋划进军中原、打回老家去的战略。首先，灭掉了周朝南土最大的异姓国——申国，并“将申国变成了楚国的第一个大县”，随后一个回马枪灭了息国，让楚国下属的“县”增加到3个。正是有着鱼米之乡的荆州作为坚强后盾，拥有铁血手段的楚国很快就将整个江汉平原囊括怀中，随后兵分两路，分别直插南阳盆地和大别山一带，悄然开启了重返中原的征战之旅。

虽然，后世很多人将申国、息国相继被楚国吞灭，归结于红颜祸水，归结于绝色无双的桃花夫人，但聪明的楚王却用“好色”掩饰了自己争霸的企图。随着权国、罗国、邓国、绞国、申国和随国、息国、蔡国、郑国相继并入楚国版图，楚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了。正如文史达人王伟先生在《楚国简史》一书中写的那样，“楚国占领了从川东、湖北、河南南部到安徽的土地。此时的楚国疆土，形成了一个新月形的版图，包围着中原地区。”

当时，由于周王朝已日渐衰落，天子只得默认了楚国的举动。然而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就在楚国意气风发、准备大展鸿图之时，齐桓公称霸的时代也同时到来。于是，由齐桓公主持的诸侯盟会——“北杏之盟”，成为春秋时代里程碑式的盟会。因为，这是第一次不是由周天子主持的盟会，而主持者齐桓公是得到天子封为诸侯国老大——“伯”。于是，手持周天子尚方宝剑的齐桓公，就把矛头对准了后起之秀楚国。

此时，历史已经悄然进入到了楚成王时代。楚成王，就是息夫人——那个用美貌引来祸水被楚灭了息国的夫人、亡国后被虏到楚国成为楚文王“老婆”。

楚成王年龄不大，但极其聪明，为了防止以齐桓公为首的中原诸侯国集团对楚国的联合讨伐，他先是赶紧停下了楚国向北方地区扩张的步伐，以稳住同样野心勃勃的“齐老大”。同时，又更加殷勤地向周天子进贡，低眉顺眼的向周天子俯首称臣，从而麻痹了周天子，赢得了为周朝守护南方的正规“名分”。楚国得以名正言顺地扩张，从而掌握了江汉平原周边越来越多的资源，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循环之中。以至于张仪在游说楚怀王时就曾总结说，“凡天下强国，非秦而楚，非楚而秦”。这一点，倒是与2000年后复旦大学教授杨宽先生观点相同，“在战国时代的七大强国中，领土以楚为最大，兵额以楚为最多，武器以楚国铸造的最为锋利，楚国的资源也很丰富，山泽出产也很多，手工业也很发达。”特别是楚人将扬越的青铜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，掌握了分铸焊合技术，独创了失蜡法等铸造工艺。这一工艺，至今仍在铸造航空发动机、导弹和精密仪表时采用。

正如司马迁所说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虽说，楚国依托以荆州为中心江汉平原，既掌控了富裕的大粮仓，又能汲取东西南北之长，但建在广袤无垠平原之上的楚都纪南城无险可守，极容易被攻破，再加上后人在楚国繁荣中滋生出的优越感，导致纪南城多次被攻破，最后于公元前278年在秦将白起的那把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，直接导致屈原投河自尽，楚国都城被迫迁往河南淮阳。离开了江汉平原的楚国，虽然回光返照般地又生存了50多年，但丢了“根据地”的楚国开始走下坡路。公元前241年，楚国又在秦国步步紧逼之下，再次迁都至安徽寿春。19年后，楚王负刍丢了寿郢，当了秦军的俘虏。

在秦国强势崛起的强大历史车轮碾轧之下，一个无比灿烂辉煌的楚国就这样在公元前223年悄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。正如王伟先生所言，“征服了楚国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能与秦国相抗衡”，秦国用铁腕手段迅速结束了战乱纷争的战国历史，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。

荆人纪事

万千山水一壶中

——荆州紫砂壶收藏家吴昊的紫砂情怀

□ 曹歌

紫砂壶收藏家吴昊。

中国文物鉴赏界传奇人物王世襄，从一堆尘封丝绕的旧家具旁走过，一眼就能辨出哪个是明代的家具，此为文物鉴赏的最高境界——“望气”。人以为神，不可信，但所谓井蛙言海，夏虫语冰，不足辩也。

世襄老人已登仙界，事不可考。但在湖北监利这座滨江小城里，有一位老人，在一堆紫砂壶中，扫一眼即能辨出真假，进而断泥料、明工艺、判其价值，也是神乎其技，虽不能说“望气”识壶，但这种眼力，也是世不多见，堪称一奇。此人就是被紫砂玩家尊称为“昊伯”的荆州紫砂壶收藏家、鉴赏家——吴昊。

“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”。紫砂江湖，波谲云诡，深不可测。光是紫泥、朱泥、段泥、降坡泥和由此衍生出的数十种泥料就让你如坠云里雾里，不辨东西，再加上各种制作工艺，全手、半手、机工，灌浆、化工壶等等不一而足，令人望而却步。昊伯能有此境界，是其近半个世纪心血修炼而成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明人周南起的《阳羡茗壶系》，让年轻的昊伯初窥紫砂世界的风情万种、巧夺天工，从此痴迷其中，心心念念，不能忘怀。一次出差到辽宁沈阳，在故宫门前，有人兜售紫砂壶，其中有一把据说是邵大亨制作的。不玩紫砂，不知道邵大亨，在中国紫砂界，邵大亨如同画中吴昌硕、齐白石；书中王羲之、颜真卿一般的存在。当时昊伯并不知晓它的价值，但觉得亲切、熟悉，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，于是毫不犹豫地掏出身上仅有的100元，又向同事借了40元，140元收了这把大亨僧帽壶。在那个年月，这可是昊伯3个多月的工资。

一壶入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40多年的光阴，从青年到白头，如今，“几壶斋”中500多把形态各异的紫砂壶，勾勒出昊伯半生的追寻和探索。时大彬的古拙简朴，陈鸣远的清秀沉雄，邵大亨的铁骨庄建，陈曼生的曼妙多姿，翟子冶的瘦硬清拔，顾景舟的华贵雍容，壶以人名，人以壶传。对于昊伯，每一把紫砂壶，都是一个文人的梦境，是波光云影、杏花春雨的悠闲所在；是唐诗的故土、宋词的花苑；是烟笼寒水、画舫船头的飘渺意境，这里有文人的风骨，蕴含着历史的契阔与一切过往生活的无边风月。

在紫砂壶极端小众，尚未被众人所熟知的年代，昊伯无数次来往于鄂苏之间，寻矿黄龙山，问“道”丁蜀镇。踏破铁鞋，“茅庐数顾”，只为一睹传说中一把好壶的风采，一解心中疑问。久而久之，宜兴紫砂圈子都知道有这么一位来自湖北荆州的“壶痴”。其好学的态度，对于紫砂异乎寻常的热爱和感悟，让很多制壶老师傅都愿意指点一二。

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，在于口传心授，如武术中的内家拳法，中医的脉诊针灸，紫砂亦是如此。600多年的发展历程，很多匠人在创作过程中，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制壶秘籍。昊伯于此间磨砺多年，移樽就教，程门立雪，终悟“泥、型、工、款、功”紫砂五艺之妙理。

寻壶、藏壶，除了工作，就是壶。由此被人讥为“玩物丧志”，然而时间证明了一切，昊伯于玩中得趣，壶中悟法，玩出境界，玩得工作屡出佳绩，玩得生活云淡风轻。

筑台邀月，种蕉邀雨，藏壶寻梦。

于昊伯而言，每一把紫砂壶都是生命的涅槃。千万年前形成的个性独具、色彩斑斓的砂矿，经过岁月的陈腐，百转千回的提炼，匠心打磨，成型成器，再经千度窑火淬炼，窑变新生，期间拥有的自由和灵性，暖手温心。一壶在手，可以把玩，可以品茗，可以幽赏。与壶对话，可以缓解人世的冷暖和淡漠，可以调剂生活的苦辣酸甜，可以领略到来自心灵之外的豁达与自由。茶靠泡，壶靠养，平时养的虽然是壶，其实是在养自己。养壶的过程，也是人修养身心的惬意时刻。寻壶、藏壶、做壶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，然而，紫砂也在用蕴含其间的灵性反哺、陶冶爱壶者的精神品性。

每遇尘世烦恼，紫砂能让人心沉静，凝神静虑，少躁专一、得养神之用。杜甫有诗曰：“始知豪放在精微”。在鉴赏紫砂过程培养出来的耐心，细心的素质，让昊伯在工作、生活中从容不迫，不疾不徐；紫砂壶上的精美陶刻，是他学习传统文化的立体读本；紫砂造型讲究心悟手出，耳濡目染，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很高的审美修养，这给作为新闻人的昊伯以很大启发和帮助，让他能在看似寻常的故事中发现蕴含其中的生活之美。几十年的新闻生涯，多次斩获中国新闻奖和湖北新闻奖，他说，这里面有紫砂艺术给予的熏陶和营养。

吴昊收藏的大亨僧帽壶。

悠游于紫砂江湖近半个世纪，期间有清溪蜿蜒，也有浊浪排空，然不论风云如何变幻，依然初心不改，只陶醉于紫砂文化内在的魅力和美学价值，对于附着其上外在的财富淡然处之。昊伯对紫砂的感情，一如慈父对幼儿，晨昏相伴，日夜摩挲，几十年的相处，彼此好像有了心灵上契合，彼此营养，共同成长。

在他看来，紫砂方圆器的柔中寓刚、方中寓圆，圆中有变，就是一卷立体的《中庸》；而师法自然的“花器”，花卉翎毛、瓜果鱼虫、梅兰竹菊，一应俱全，在匠人慧心巧手之下，散发自然的清新和广博，一壶在手，“卧游”大千，壶中山水，胸中丘壑，何须远足；而“筋囊”的精确严谨、纹理清晰，明暗分明，做人著文理应如此，紫砂壶中蕴含的灵性和精神，是生活的艺术。一把好壶自有其非凡气度，人学紫砂壶之大度，必能遇事豁达，心胸宽广；人学紫砂壶之广阔，必能智达高远，光明磊落。

> 邵大亨的各式传器，堪称集砂艺大成，刷一代纤巧糜繁之风……创作形式上的完美、技艺的高超，大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之慨
>
> ——顾景舟

一把壶，一段情，一个故事。数百把壶数百个故事，串联起半个世纪的人生，他说，其实懂不懂壶，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不论对待生活和工作，都要有专一执着的品行和认真的态度。

如今，在滨江小城柳风波光的岁月里，在茶香浮动的“几壶斋”中，昊伯继续他的寻壶、藏壶、鉴壶、品壶、说壶、做壶的悠游生活。他说，准备写一部关于文人与紫砂的故事，为当前孔方势盛，鱼龙混杂的紫砂世界，增添一点文化的因素和传统的营养，也为他半生的紫砂之爱，做一个总结。